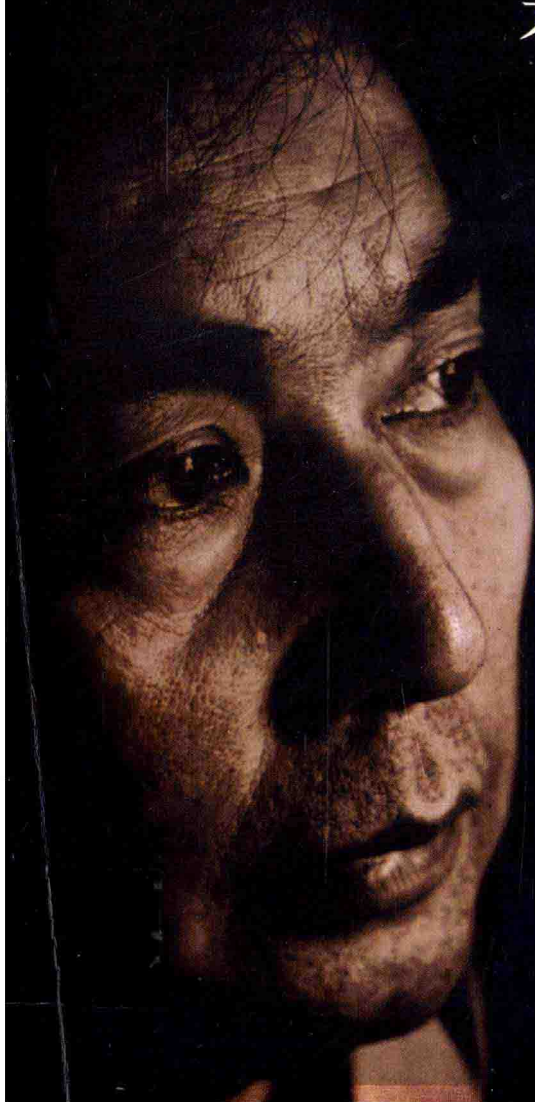


黄济人文集

平心堂



第一卷



黃濟人文集

• 第一卷

重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济人文集 第1卷/黄济人著.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9.10

ISBN 7-5366-4683-6

I. 黄… II. 黄… III. 黄济人—文集 IV. I 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6348 号

责任编辑 陈 琨

封面设计 邵大维

封面题字 贾平凹

封面摄影 田捷民

技术设计 聂丹英

黄济人 著

黄济人文集(第一卷)

HUANGJIREN WENJI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新华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19.125 插页 7 字数 439 千

1999 年 9 月第一版 1999 年 9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

ISBN 7-5366-4683-6/I · 903

定价:30.00 元

自序



我们现在评价历史,历史将来评价我们。我把过去的作品编成文集,为的就是将来的目的。

1999.7.9

黄济人论

——从《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和《崩溃》谈起

孙 自 筠

黄济人在《我不敢画出自己的眼睛》中说，他父亲在黄埔时与同科同队的同学邱行湘、陈肃联姻，“他们联姻，也许在国民党的官场斗争中发挥过抗力，可是落在我们这些后裔和晚辈的脖子上，却是一环扣一环的枷锁！甜头他们吃过了，苦头我们正在吃。”黄济人确实为此吃尽了苦头，付出了代价：该上学时不能上学，该工作时不能工作，那怕是下乡当农民，拼死累活地挣得些光荣，也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帽子压得失去了光泽。幸好他所在四川威远县的干部慧眼识英才，给他安排了能发挥他所长的工作，不过，却未能彻底改变他的命运。但祸与福往往一纸相隔。三中全会后，一夜春风，万树花开。当黄济人1977年考入内江师专中文系时，他才发现原来上辈们套在他脖子上的锁链竟变成了根魔绳，一根一头连着缪斯，一头连着命运的金色飘带。他顺着这条彩带艰苦地攀援着。几易春秋之后一本以国民党战犯狱中生活为内容的报告文学《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于1982年出版了。它轰动大陆和港台，在欧美东南亚也激起反响。以后，又陆续发表了小说《崩溃》、《哀军》、《战争的天平》和报告文学集《征夫泪》等一系列以国民党将军不同时期生活为内容的作品，成为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黄济人这粒几

被埋没沤烂的文学种子,迎着时代的雨露阳光,生根发芽,茁壮成长了。

上 篇

—

无庸讳言,《将军》的成功首先是题材的成功。本来,报告文学对于题材的要求是苛刻的,这是它的新闻性、时效性所决定的。粉碎“四人帮”后,文艺春天到来,题材禁区被打破,以前那些不好写不能写不敢写的神秘角落,逐渐被揭开。在题材角逐中,黄济人的优势是其他人难以企及的。从小,他就被那张无形的网所困扰,品尝着父辈留下的苦涩。而当他进入大学,系统地学习文化知识并进入创作准备时,他才意识到那苦涩难堪的往事原来与一个取之不尽的财富矿藏相连。于是他果断地决定自费外出采访,将所得的新鲜材料和原来就烂熟于心的记忆连贯汇合,再加上多年所得的知识积累和情感积累,用熟练得近乎老到的文字表达出来。作品不仅真实地记叙了国民党将军们十年的狱中生活,他们的思想进退和演变,也通过他们的身世经历,反映了一大段中国历史。同时,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作者脉搏的跳动和感情情绪的释解。因为黄济人对这一题材的选取,不同于那种记他人之实写他人之事的纯客观的采访,更不同于那种凭残简断片、道听途说就漫无边际大发议论,靠词藻堆砌起来的空泛报告。他的情感与神经与所写的人和事达到一种心灵感应的境界。故而,写得真,写得实,写得动人心魄,感人肺腑。难怪有人读了《将军》以后,还以为一定出自一位上了年纪

的老作家的手笔哩。谁又想到，一个刚入而立之年的青年人，竟能写得如此深邃，如此神采飞扬，如此体察入微呢。

但是，黄济人究竟没有与功德林里的那些将军们朝夕相处，对他们的了解也是间接的，更多的材料来自转述和阅读。更加之，他的生活经历、思想起点不同，存在着不可逾越的“代沟”。这就给他留下一个艺术的距离，使他能跳出个人的感情天地，站在更高更远的地方，从不同角度和方位，去观察、去俯视、去揣摩、去比较，以青年一代的全新观念去审视父辈的历史；又如站在功德林八角楼岗哨上，每条胡同里发生的事情都尽收眼底了如指掌。于是，战犯的狱中生活在作品中处于既有宏观扫描，又有微观透视的目光的照射之下。加之，作者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现代人的价值标准作为尺度，把一个十分难于驾驭的题材，处理得贴实而又有分寸，——谨慎而又不拘谨，大胆而有节制。无论思想或艺术，都使人感到无懈可击，显示了艺术处理的熟练和从容不迫。这大概是不知情者以为这部作品出自一位有把年纪的老作家之手的又一原因。

二

如果我们把《将军》仅仅当作一本消遣性读物，它揭开了战犯管理所高墙上的神秘纱幕，让人们看看这些当年扬威沙场的国民党将军们在牢狱中的狼狈，满足读者窥秘心理和猎奇爱好，那当然是很不严肃的；甚至，我们把它仅仅作为一本国民党战犯在共产党教育下自忏罪恶，改变反动立场，然后走向新的生命起点为内容的书，也还是很不够的。是的，作品中确实写了不少这些将军鏖战沙场，胜败得失的征战和许多轶闻趣事，以及他们成为阶下囚的颓丧

和狼狽，但这只是一些为一个崇高主题服务而写的生活现象。作品致力表现的，是在于说明，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打败国民党反动派、消灭剥削制度的这场革命的伟大意义在于消灭那个制度，摧毁它的统治，而不在于消灭人。那怕是罪大恶极的战争罪犯，在他们放下武器成了俘虏后，也把他们当作人，对他们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然后，把他们改造还原为真正的人。此其一；而与这一主题并行不悖、并在更深层次中包蕴着一个更为广阔，更为深厚，更具有永久价值的主题，那就是人应当怎样去选择和对待人生。作品中写到1959年12月14日下午3时，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特赦人员，他在一位头发花白者面前停下，叫了声“曾扩情。”曾扩情是黄埔一期生，曾在周恩来的政治部当少校科员。面对新中国的总理，自己过去的老师和上级，他泪流满面，半晌才说出一句话：“周先生，我走错了路。”面对曾扩情的唏嘘，我们会领悟到一个严峻的人生课题：人生尽管有多次选择，但至关重要的只有那么一两次。世上几多千古遗恨，就在于错走了那关键的几步。功德林的将军们几乎每个人都有过使他们悔恨终身的选择。眼下，他们又经历着一次选择。不过比起以前，他们聪明清醒多了。

个人的历史是时代历史的缩小。功德林百余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几乎每个人都亲自参加、指挥过多次战斗战役。他们在国民党政治生活圈子里起过巨大作用，把他们的个人历史加起来，可以汇成一部中华民国战争编年史，一部国民党蒋家王朝大陆败亡史。接下来，还是一部战犯新生史。作品的史料价值是不容忽略的，其容纳之丰，记事之细，描写之生动细密，评说之精当确凿，令人大开眼界，叹为观止。

但历史只是已发生的事实的客观记载，《将军》一书具有历史

价值却不等同于历史教科书,如果一定要把它当“史”,那它是一本“心史”,一本反映被俘国民党高级将领思想转变的心灵演变史。而作者正是在这上面费尽心机大做文章的。

从将军到囚犯,这是杜聿明、黄维、邱行湘、康泽、王陵基、沈醉等难以接受的。但是,战败之将,身不由己,只有悉听摆布;从豪华别墅到挤通铺,从呼奴使婢到自己动手,是难以适应的,但只有放下架子,屈尊将就了。于是,王陵基学会了穿衣,邱行湘掌握了挑担,杜聿明发挥了他剪裁缝纫的才能,孙殿英、杨明轩戒掉了几十年的鸦片老瘾。但是,一当触及思想灵魂,就不那么简单了。打了败仗,当了俘虏,不得不认输。你共产党信共产主义,我国国民党信三民主义,各为各的主义,我错由何来,又何罪之有?虽然,他们以后经过长期学习改造,立场观点发生了变化,由认输认错到认罪认罚,走上革面洗心的新生之路。但是,他们所经历的心灵曲折,苦痛哀怨,却是那么难以言说的回肠荡气刻骨铭心。

邱行湘是串联全书的主要人物,他的心灵演变历程具有一定代表性。作者把他的新生之路作为一条情节主线,用他的思想变化的曲折进退来说明一般。在艺术上把他放在典型化的高处。作品从邱行湘走上他的人生顶点旋即跌落作为开端:1948年3月5日,他受蒋介石召见,委任为青年军206师少将师长兼洛阳警备司令。当他挺起胸脯走出主席官邸回到洛阳不及十天,就从人生顶峰跌入低谷。从此,邱行湘从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战场,转入一个虽看不见刀光剑影,听不见枪炮轰响,却是更为激烈尖锐的灵魂拼搏的战场。

邱行湘毕业于黄埔,出身正统,且征战南北,多有战功,有“邱老虎”之誉,深得上司信任和蒋介石恩宠,不免骄横自负,不可一

世。一旦兵败被擒，当了俘虏，如虎陷囚笼，奔突碰撞，野性难收。先是感到愧对蒋介石的重托，陈诚的栽培，“不成功便成仁”，欲一死以谢党国；后是不甘失败，企图伺机逃跑或盼望解救，以东山再起。当跑不掉，死不成，也不愿就范甘当囚徒。他硬顶过，软泡过，在幻想和等待中打发日月。那怕是后来他已走出了与国民党决绝的重要几步——给黄剑夫写策反信，写出交罪的《自传》——后，仍摆不脱阴影的纠缠，又走上一条意欲超脱物外，得过且过的人生岔道。

但是功德林不是修行炼气的庙宇，更不是孤立于时代之外的仙山，它是“机器”，是一部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的运转灵活自如的国家机器。它的威力虽然离不开武力和强制，但更主要的是来自真理的感召和人道的感化，来自共产党人对过去的敌手的人格尊重和人情关怀。邱行湘是一介武夫，怕就怕的这个。他终于折服了。如果说，他写交罪的《自传》还有几分勉强，那他抄写战犯给毛主席的《感恩信》则完全出自自觉。后期，他在秦城农场的劳动感受，已与他的人生理想和追求联系了起来，与以前把劳动当作劳筋骨、苦心志，麻痹神经的想法，当作争取表现以求得宽大的动机，有了根本的区别。

邱行湘的变化历经痛苦与曲折，既符合他的阅历和个性，又符合生活的常理与逻辑，使人感到顺乎自然，水到渠成，没有雕琢与虚饰。作品的 67 小节中有这样一段描写：邱行湘在未成为共产党战俘前，他曾饶有兴致地观看过国民党的战俘，见过红军师长侯中英、新四军军长叶挺。他回想他们当时对他们是什么态度，有什么想法。而今，他成了胜利的共产党人的战俘，上至战犯管理所所长，下到炊事员，以及其他干部、医生，对自己，对其他“同学”，甚至对日本战俘，又是什么态度？“午夜扪心，终不能寐”。他的思想感情因

此得到开启和升华,不仅促进了政治立场的转变,并对他的人生态度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他主动去照顾一个失去双腿的“同学”的生活起居,不怕脏和累。他的行动很快起了连锁反映,影响到徐远举。邱行湘感到自己的心胸一下宽敞了。而他的人生道路,也一下宽敞了。

邱行湘虽是一介武夫,但他的思想情感也并不都是一律的直角形、粗线条。他的内心变化常有狂风大作时的波涛翻滚,也不时有微风过后的涟漪点点。作品很善于开掘人物内心的隐秘,通过一些纤细微妙的情绪变化,写出人物性格的某些本质方面。如邱行湘本想抄写给毛主席的《感恩信》,不便毛遂自荐,就先推举杨伯涛,杨反推他。他默不做声眼巴巴望着文强,因为文强曾向他讨教过写字的诀窍,于是文强心领神会地推荐了他。经过一番迂回,他终于如愿以偿。又如新中国成立后,战犯集中北京功德林,邱行湘犯嘀咕:“共产党人会不会因为获得政权而脸色由红转青甚至长出一对獠牙来呢?”他作了一个试探:与往常一样与蒋所长开玩笑,捋捋他的胡子。结果一切如常。他的顾忌打消了。这些细枝末节的描写,把邱行湘神经末梢中最隐蔽的想法,也都毫发毕现地描画了出来,反映了作者创作思维的细密精确,显示了一种文学创作上的“微雕”功夫。作品中还有一些关于邱行湘个人情感活动的描写,如他对女友张小倩的深情怀念,幻想着有个小小的家庭,等等。这些看来平淡无奇的纯属人之常情的穿插文字,既成了促使邱行湘走出功德林大门的一种推力,也从一个侧面勾画了他性格的丰富内容。

邱行湘是个性格鲜明的人物,但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人物。作者把他置于一张网中,一张现在与过去交织、外部关系与内心矛盾交织的网中。这既是一种结构艺术,也是塑造人物的手段。通过这方

面的联结交叉,把人物性格特点和心灵历程展示出来,凸现出来。由于作品的成功塑造,使这位“失踪”多年的将军重新被人们发现认识,再一次成为名满全国的“新闻人物。”

三

《将军》所写的是一个群体,一个同属国民党战犯的命运与共、同病相怜的群体,又是一个杂色纷呈,矛盾百出的群体。在那些将军中,有的是“嫡系”,有的是杂牌;有属何应钦派,有属陈诚派;有少壮派,有老军阀;有出身贵胄名门,有来自百姓和草莽;有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有“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遗老遗少。于是,功德林成了一个色彩斑斓,生旦净末丑一应俱全的人物性格大千世界。尽管他们目标一致,又是站在一条起跑线上,但脚步有快有慢,路线时直时弯。而心灵的轨迹,则更为迂回起伏,曲里拐弯,纵横交错,难以捉摸。作品的成功恰恰在于写出了这种“难以捉摸”,从中理出头绪,有重点的突出一些人物,代表各种类型。于是在作品中既有单独的有个性的人物,又是有着内部联系的浑如一体的人物群体。写出了他们的性格命运,生活道路,生命轨迹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从而显示了作品思想内容的丰富丰满和艺术营造的多彩多姿。

与邱行湘一样,将军们被俘之初,大多想到自杀或逃跑。而当跑不掉死不成时,就转入苟活、等待,听天由命,得过且过。这是一个比死更痛苦更难熬的日期。高头大马,威风八面的日子过去了,而今成了听人摆布的阶下囚徒;养尊处优,锦衣玉食的日子过去了,而今是大锅饭菜,粗布囚衣;过去是人家看自己的脸色,揣度自

己的心思，而今要看人家的脸色，猜度人家的心思。一切翻了个个儿，叫人难以置信。特别是旧的信念已经或开始崩溃，新的信念尚待建立。于是，难以抑制的怀旧、恋旧、悲凉、绝望之情油然而生。这几乎是他们一致的情感经历。无独有偶，我们在海峡对岸作家白先勇的作品里也看到类似的描写。在他的著名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中，写那些曾经在大陆上显赫一时，到台湾后失去往日的权威，变得如走了气的皮球似的末路英雄的精神状貌。他们孤独、失落、悲哀、苍凉、唱着“我好比浅水龙，被困在沙滩，”悲悼着失去的岁月。这与黄维在监狱中发出的“龙困浅滩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哀叹，其心境遥遥相通。不过，前者虽然肉体是自由的，但精神是绝望的；而后者，虽然被锁在功德林的高墙内，却有一个崭新的人生在召唤他。

但是也有例外。原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虽身处绝境却不绝望，花钱买了《资本论》，为的是“知己知彼”，好在共产党的老祖宗马克思那里“开刀”。结果事与愿违，经过细心研读，反倒被马克思指点迷津，认识到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反被开了一刀，割去了毒瘤。

能背诵《易经》的国民党三兵团司令张淦，其实是食古不化，把一生竟系在风水八卦上，哲学观点走火入魔。后来经过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学习，茅塞顿开，找到朴素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相通之点，打破了他思想转变的一大障碍。

对原国民党政府四川省主席、上将王陵基的描写，篇幅不多但却十分精彩，三几笔功夫就漫画般勾勒出一个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封建军阀怪胎。长期的封闭自守养成他近乎滑稽的顽愚与短视。功德林的生活使他失去了过去的威风气势，而得到的是他从未品尝

过的实在而有意义的人生。新时代的春风使他的生命枯枝抽发出新芽。

十二兵团司令黄维，却是另一种类型，他一进功德林就找碴骂人，借故生事，甚至公开表示“粉骨碎身全不惜，要留清白在人间”。后来因病住进医院，一躺四年，五种结核病医好四种。按说，就凭这，也该对共产党感恩戴德，从而心回意转。但他依然故我，多次受批判仍无悔改之意。他想入非非要发明“永动机”，从一个人生盲区走进另一个人生盲区。甚至在得到有郭沫若院长签章的中科院所作的否定性鉴定后，他仍不死心，继续推他的西西弗斯石头^①。直至多年后，黄维早已特赦出狱，他的“永动机”的梦还在做，不过换了名称，叫做“重力”发动机^②。可见他有一股九条牛也拉不回头的犟劲。不过，科学与谬误往往只一步之差，也许他在奇思妙想中捕捉到通往成功的密码。这种例子在科学史上也不是绝无仅有的。让我们祝愿他成功。

功德林是一个特殊的战场，对国民党战犯的改造是一场较之真枪实弹交锋更为艰巨，更为复杂，更为惊心动魄的战斗。共产党人依靠手中掌握的真理，依靠耐心和等待，使这些高度迷信自己学识和价值的将军们，最终在真理面前纷纷低头，承认战场外的失败，心甘情愿地再当一次“俘虏”。《将军》这本书准确而细致地反映了这一亘古未有的庞大复杂工程的全过程，把数十名战犯的改造经历，心灵历程生动活脱地勾画在纸上，形象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巨大深刻变化。作品所体现的历史价值和政治意义，是怎么评价也是不会嫌高的。

四

《将军》是黄济人初试锋芒之作,但一矢中的,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固然有题材的因素,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正如下乡知青成千上万,成为作家者寥寥可数。黄济人的成功更主要的还在于他确实写出了水平,写出了特色。当读了作品,不能不佩服他笔墨的从容自然,驾轻就熟,挥洒恣肆,游刃有余。看不出初涉文坛的稚嫩和小家子气,相反,却颇有一种雍容的气度和大家的风范。

这首先表现在作品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宏阔的气势上(这自然与作品雄浑博大的主题思想有关)作品写了大量的人和事,但不是展览式的就人写人就事写事,而是把人和事放在一个广阔的时代空间和历史背景下加以考察。每个人每件事都不是单独孤立的存在,与过去、现在,与他人、他事,与历史演变,与最新事态,都密切相关,紧紧勾连。功德林是块禁地,但因其中人物的特殊身份,使它的动静联系着国际国内的风云变幻,牵动着海内外许许多多人的神经末梢。作者充满着自信和胆量勇闯禁区,并以驾驭浩大场面的艺术气魄,运斤成风,笔走春秋,客观准确地报告了将军们的改造生活内幕,和他们心头的忧喜苦乐。不因为他们是将军而拘束笔墨,也不因为他们是囚犯而随意丑化。轻,会失去历史的严肃态度;重,则丢掉历史的宽容精神。在艺术上小手小脚是驾驭不住的。对战犯管理所的干部管理人员,作品里着墨不多,虽由衷地崇敬之情溢于言表,但并不故意拔高和理想化,突出写他们的质朴、随和、人情味。和颜悦色中不失原则和严肃,亲切笑谈里包含着鼓励和催促。他们从不对手下的俘虏声严色厉,但磅礴的气势和千钧的力量

却从他们的微笑中流露出来,显示了共产党人改造世界的伟大胸襟和魄力。而这一切,都靠作者的传神文笔和优游不迫的叙述,向我们传递出来的。

相当的议论深度和哲理高度,是《将军》具有大家风范的又一显示。功德林里的国民党将军,许多是科班出身,受过系统的资产阶级和封建思想教育,具有完整而根深蒂固的剥削阶级世界观,有的甚至还构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体系。对他们,仅凭人道的关怀和情感的打动,是难以动摇他们的思想根基的。理论上的说服和哲学上的驳倒,这虽不是作者的任务,但如果缺乏相应的学识,是难以完成这个报告的。从作品描写看,作者对《资本论》、政治经济学、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都下了研究的工夫,显示了作者的理论功底和作品的学术化特点。说理的透辟精到,推理的敏锐机智,以及哲学讨论的深入细密,显示出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和难以追赶的速度。不仅张淦对《易经》的迷信,陈长捷对《资本论》的“开刀”,需要理论击倒和点化升华,就是黄维的“气节”观,邱行湘的“成败论英雄”,也需要历史知识和阶级学说加以照射,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

至于这部作品在语言上的挥洒自如,举一反三,叙述流畅而逻辑严密,不时又有诙谐机趣穿插其间。虽然,个别地方有因词伤意的微疵,但整体看来,博雅明快,强劲有力,具有节奏感和整体美,也显示着一种艺术气势。

黄济人构思写作《将军》之时,正值新时期报告文学初潮兴起,《哥德巴赫猜想》、《亚洲大陆上的新崛起》、《大雁情》等报告文学名篇都是这一期间发表的。但较这些作品,《将军》却有自己的贡献。它不仅仅是在内容上有所创新,发掘了一个被称之为“冰冻新闻”的题材,也不仅仅因为它篇幅长,属最早的长篇报告文学之一,更

主要的是它对文学性的加强。新时期之初，报告文学大体上沿着六十年代的路子在走。但进入八十年代，报告文学在文体上出现较大突破；《将军》则是较早反映这一突破的长篇成功之作。这文体突破的特点之一就是文学性的强化。我们读《将军》有明显的读小说的感觉，无论在结构布局、悬念设置、人物塑造、语言表达上，都显示出小说的特点。尤其是人物典型化方法，明显的艺术虚构和故事化、情节化，都是。从现代的目光看，任何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都是作家充分发挥艺术感觉进行丰富想象的结果。作家将种种抽象的观念具象化，将整体感受形象化、细节化，从而使作品更具有征服力和艺术韵味。这是一种审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将军》是更接近小说的报告文学。作者的美的追求的思路是明显的，他以后所创作的《崩溃》等纪实小说，正是这个思路的伸延。

其次，《将军》的贡献还表现在它的恢宏气势和历史的纵深感上。我们只要读一读在它两三年后发表的《唐山大地震》、《在这片国土上》等报告文学作品就会发现，它们的“全景式”，它们的“现实性与历史的深广性相结合，”竟与《将军》如此神似。我们没有根据说谁影响了谁，但至少，黄济人是先走了一步。

下 篇

五

黄济人于1984年发表的小说《崩溃》，从写作时间看，当是《将军》的续篇，而从其内容看，则应当是它的序篇。还是其中的人（虽然不是全部），还是“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的主题。不同的是，虚构